



文本研究与 文化阐释的维度

刘 海 燕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文本研究与 文化阐释的维度

刘海燕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研究与文化阐释的维度/刘海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01-015240-0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100 号

文本研究与文化阐释的维度

WENBEN YANJIU YU WENHUA CHANSHI DE WEIDU

刘海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5240-0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中文系的本科生,全部从旗山迁回仓山老校区了。当初迁往新校区,舍不得老校区;现在对新校区却又有些留恋了。福州素有“左旗右鼓”之称,鼓,即鼓山;旗,就是旗山,旗山在乌龙江南岸。如果不是太赶时间,上课前早个二十来分钟到达新校区,恰好碰上空山雨后,青山如洗,白云绕舞,“逶迤飞动,如旗之风靡”,此即旗山也!一时神情大为清爽。就人文言之,溪源江水紧贴校园而过,沿溪上溯,有溪源宫。乌龙江岸,有旧侯官市,“庙踞鼃鼃石,神依土木丛”;“日泻帆光澹,江澄塔影寒”,遗迹犹然可寻。明朝林春泽,居旗山北屿,历成、弘、正、嘉、隆、万六朝,正德进士,活了一百又四岁,有集曰《人瑞集》,子嗣后人,多有文名且长寿;瓜瓞连绵,五六百年来,水西林一直聚族而居。

老校区,又称仓山校区。仓山,即藤山,古名瓜藤山,后贩盐者割为私仓,遂称仓山,其名沿用至今。藤山,在闽江南岸,西起上渡,东至中洲,连绵五里,以其地多种瓜,瓜有藤,故名。藤山北岭,旧有天宁寺,南宋李纲谪居于寺之松风堂。明代藤山人周仕阶,嘉靖举人,仰慕李纲为人,自号天宁居士,其诗集名《周天宁先生诗选》。其子之夔,崇祯进士,重修松风堂,入清不仕,有《弃草集》。藤山北望,一水之隔,有晚清林纾的苍霞精舍。藤山南麓,旧时岁杪,郡人载酒来游,人称梅坞。“藤山梅万树,冬尽一齐开”;“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此明代文人咏藤山梅之诗也。福州开埠之后,梅坞徒存其名,代之而起的是教堂错绣,领事馆比肩而立,“千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下”。民初,国民政府前主席林森先生曾就读于英华学校,风风雨雨,如今林公馆修缮一新,青砖瓦舍,掩映于高楼之中,也是藤山的一道风景。

予生也晚,不及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校调整,自然也没有见到福建师范学院在藤山麓挂牌的盛况。青砖学生宿舍,地板嘎吱作响的筒子楼,通往音乐系的小木屋,遗世独立似的教工之家,短道游泳池,已经无处寻觅。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到母校,总是千方百计想在校园中寻找过去的那些记忆,你可以指着两座八层楼高的研究生宿舍对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您住过的青砖楼,还是叫十四、十五号楼,记忆与现实,两者之间还有着些许的联系;但是,当您兴冲冲去寻找短道泳池,路径找不到了,即使有识途的老马领着您去指认,面对建筑群,您只能茫然不知说啥是好。

建筑传统可能有中断,这对一所学校似乎关系不是特别大。况且,老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如老华南建筑群还在,老音乐系建筑群也还在。比起建筑,一所大学、一个院系,文化学术传统的承传要重要得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期集中推出三套丛书,其中两套分别以两位学科奠基人,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第二任系主任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斋名——六庵、桂堂命名,用意了然;另一套取名“藤山”,似也有看重文化积淀、学术承传之意。

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道德文章,其他两套书的序言都有精辟介绍,兹不赘。说起老中文系的旧事,我曾经在《听彭一万讲五十年前事》略有述及,彭先生知道的比我多,体会也比我深刻。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件旧事,一件近事。

十五年前,我编光泽高澍然《抑快轩文集》,偶然接触到黄曾樾教授(1898—1966)的生平著述。20 世纪 20 年代,黄先生在福州文儒坊拜石遗老人为师,治诗古文,石遗老人每有讲授,黄先生退而录之,结为《谈艺录》一书出版,30 年代中华书局已经印了 3 版。石遗老人论闽古文家,首推朱仕琇,高澍然次之。朱氏有《梅崖居士文集》传世,而高氏古文尚无刻本。黄先生不忘师训,十多年间,不断搜集高澍然古文 160 多篇。黄先生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1943 年,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黄先生供职驿政,也到了永安。日机空袭山城,“每遇警报,挟册而行”,就是说,每当空袭,黄先生随身带的就是他搜集到的高氏之文。黄先生又想,万一躲不过空袭,人亡稿毁,挟册而行,并非上策。先生遂于 1944 年将高氏古文编成《抑快轩文集》上下两卷,自费在永安印行,公诸于世。

一件近事,前年,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同时馈赠两部文集。一部是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另一部是郑宝谦先生的《福

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或它的前身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书都有卢馆长作的《序》。

包树棠(1900—1981),福建上杭人。著《汀州艺文志》,六十万字,为研究汀州文化、艺文不可或缺的著作。包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代办之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建国之后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汀州艺文志》动手于1925年,完成于1930年,为其少作,除了《自序》一文发表在1930年《厦大周刊》上,全书生前未曾刊布。

郑宝谦(1938—2014),福建福州人。郑先生先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外文系,先后任教于福建农学院、华侨大学,1973年之后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大家知道郑先生曾任教于历史系,然而,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作者介绍,先生还曾在中文系任过教,看到这一介绍,让人汗颜,我们对中文系的历史了解实在太少。《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皇皇一百四十万字,其学术价值,金云铭、黄寿祺、熊德基诸前辈言之详矣。《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出版不到四年,郑先生今夏在孤独中溘然长逝,不觉为之唏嘘。

这两件旧事、近事,都和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关。黄曾樾先生获得国外博士学位之后,仍然不忘师训,一直念叨着他的老师,继续搜集研究高澍然的古文,难能可贵。老师所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学生固然可以另辟蹊径,但是老师有益的教诲,学生可能会受用一辈子,我自己便很有体会。包树棠教授,毕业于“国专”,在强调学历学位的今天,“国专”,算什么层次?其实,身份不一定都那么重要,《汀州艺文志》1930年完成,2010年出版,书稿完成时包先生还是一位年轻学人。时光已经走过了八十年,出版距离先生谢世也已经三十年!一部浮浮躁躁而产生的所谓著作,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吗?郑先生的生活是孤独的,学术也是孤独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的作者介绍,没有职称,似有为智者“藏拙”之嫌,其实公开介绍郑先生是副教授,又有何妨?一位副教授,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写出可以传诸于后人的著作,我们这些有幸忝列教授行列的教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在学术上更高地要求自己,免得后人指指戳戳吗?

收入本套丛书的作者有:黄黎星、余岱宗、陈卫、吕若涵、郭洪雷、郝文倩、刘海燕、雷文学等,他们的年龄都在四十边到五十之间,都具有博士学位、高职称。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当我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们的音容笑貌跃然于

我的眼前。比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他们的学术已经成熟,有比较丰富的积累;比起六十边上或更老的“老教师”,他们则更有活力和创造力,思维敏捷,出手快。他们是文学院各学科的中坚,承上启下;文学院的将来,首先靠的也是他们。文学院一下推出三套丛书,可能是出于作者归类的方便。何况,我上文说过,教授的论著,不一定就一定比副教授高明;同样,不是博导的教师,也可能写出比博导好的论著。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我虽然未能全部读完,但可以肯定,大家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已经做出成绩。随手举一个例子,郗文倩著作中“鱼龙曼戏”一章,即便我能写得出来,恐怕也不会如此精彩。文倩研究的领域我比较熟悉,故举以为例;其他几位的著作,也许更为突出也未可知。我强调遵从师训、学术承传,但也相信,中青年学人,一定会做得比前人、比老师更好,这样,学术才会进步。

本丛书的作者,都已经不是只出过第一本书的“新人”了,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可能是他们的第二本、第三甚至第四本了,长足的进步,说明文学院很有希望。2012年,中国内地出版的新书达40万种之多,2013年44万种,在出版如此繁荣的状况下,一本新书要超凡出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郑宝谦先生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都足以传世。本丛书的作者(当然还有我自己)都得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包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是在完成八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比起包先生,我们幸运得多,出本书似乎不是太难,但是,八十年之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今天出版的这部书?假如有人读我们这部书,会有什么反映和评价?我想,如果这套丛书有若干种足以传世,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那么我的序也就可以附之而不朽了,甚幸!

汉代,藤山草莱未辟,直到晚唐,此地方有民居。如今阡陌扑地,歌吹沸天,已为福州一大奥区。文学院将本丛书名为《藤山述林》,如前所述,取名很有文化意蕴。文学院本科生都从旗山迁回来了,假如本科生不回迁,却把研究生也迁过去,丛书该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说,那就叫“旗山述林”吧!谁又能保证,文学院不会再有迁往旗山的那一天?其实,旗山也很不错,那里空气好,山青水绿。

陈庆元

公元2014年8月24日于藤山华庐

序 二

刘海燕将她近二十年来的论文选编成集，寄来并嘱我为之序。我原本想，她硕士毕业以后，从攻读博士学位，到留在福建师大工作，一直都是在齐裕焜先生身边。齐先生之于她，既是严师，又是慈父。这篇序请齐先生来写，似乎更恰当一些。但她告诉我，托我写这篇序，也有齐先生的意思在内。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翻阅《论稿》所辑录的26篇文章，我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是它们清晰地标示出了海燕二十年来治学的经历和成长的道路。

海燕是1995年来我门下求学的，那时她才20岁。先是一年进修，1996年硕士生招生考试，她以优异的成绩被正式录取。此后三年跟着我，一直专力于明代诗文的研究。硕士毕业后她又考取了福建师大的博士生，得以师从齐先生专攻明清小说。其间，还曾从蒋松源先生学习明清戏曲，从陈庆元先生学习诗文。还借助福建师大文学院这个非常活跃的学术平台，结识了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学术视野。博士毕业以后她留在福建师大工作。后来在选择博士后流动站时，她征求我的意见，考虑到她博士论文所显示出来的理论论述的不足，和她的研究方向及以后的发展，我郑重建议她去南开大学师从陈洪先生，研修古代小说理论。她征得齐先生的同意，接受了我的建议，负笈北上，去了南开。用陈洪先生的话来说，是扛着“关王大刀”，投到了陈先生的门下。这种转益多师的结果，

使她对明清（尤其是明代）的小说、戏曲和诗文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涉猎和了解，而对小说理论深入的研修与学习，又使她开始从更新的角度，用更开阔的视野，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对她今后的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她在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论文基础上修改、润色并出版的两部专著《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她在这条治学道路上颇为丰厚的斩获。这个过程，同样也反映在这本论文集里。

这本论文集所收入的文章，大体可分为四大部分。前面3篇关于明代诗歌的论文，和后面的《历代江西小说述录》，是她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作品。其中，《胡应麟〈诗薮〉的再认识》和《历代江西小说述录》是她的两篇作业，分别发表在《中国韵文学刊》和《抚州师专学报》上。《试论明初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来曾压缩到一万余字，发表在2001年第2期的《文学遗产》上。《明初江西诗歌的崇唐抑宋倾向》一文，则是在论文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江西社会科学》编辑李华先生当场向她约的稿，数月后，便刊发在了2000年第2期的《江西社会科学》上。这样，她在硕士毕业时，在未来的研究方向上，就存在了两种选择。当她告诉我，她想师从齐先生去研究小说时，我立即表示了赞同。这一是我历来主张不要画地为牢，将学生圈死在导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限制他们的发展，更不应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翻版或“复印件”。导师的责任也不是给学生一把钥匙，让他去打开学术研究的大门；而应该是教会他们做钥匙的方法和技巧，培养他们自身的学术个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在以后所遇到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较快地进入状态，都可以有所成就。其次，是她的《历代江西小说述录》，虽然只是一份作业，但在治学态度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严谨，和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所表现的能力，以及对其中一些作品内涵的准确把握与辨析，让我隐隐地感到，她同时也具备有小说研究方面的天赋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如能得到名师指点，转向研究小说也是完全可行的。天从人愿，她得以师从齐先生，攻读博士学位3年，果然很快就在小说研究领域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后来齐先生在为她的《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一书作的序文中也特地谈及过这一点。齐

先生说：“在博士阶段她主要搞古代小说研究，她过去这方面接触相对少些，这使我有点担心。但是，经过刻苦努力，她对古代小说也有了较为深入的掌握。”这个努力的过程，很鲜明地反映在了这本论文集所收入的7篇关于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论文里，这中间的一些篇章是她博士论文写作的前期成果，一些则是这项研究课题的衍生物。论文集中收入的10篇关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版本及评点研究的文章，则体现出她沿着齐先生指的路子，在博士后流动站师从陈洪先生所取得的新的进步与收获。水到渠成，于是也就有了她的第二部著作《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的问世。当然，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评点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理论成分确实显得比较少。但正如陈洪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的“绪论”，以及为刘海燕的《明清〈三国志演义〉文本演变与评点研究》所作的序文中，所特别强调指出的：“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最光彩的内容正是在评点之中。”刘海燕已经进入这一领域了，尽管还不是很深入，但只要如陈先生所说的，有耐心细致的披沙拣金的态度，再加上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全面了解与熟悉，我想，她的研究一定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的。这本论文集中还收入了一些其他论文，涉及到她对戏曲、福建地域文学及当代影视作品的关注和思考，这其实同样是她转益多师的收获。

海燕用了近乎二十年的时间，涉猎了明代文学绝大部分领域，这看起来，的确有如陈洪先生所担心的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致没有占有一个足可称“王”的山头，很可能陷入微观的研究中难以自拔。但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将她这二十年所走过的路视作一个打基础的过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具备了更为广博的知识，和更为扎实的基础，以致拥有了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呢？她将明清文学中几种主要文体，作为打基础阶段的研究对象，既熟悉了它们各自的状况，又掌握了相应的研究方法，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走起来是否会更自在、更顺畅，研究会更深入一些呢？我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清代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曾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所谓淹博，顾名思义，就是闻见广博，学养深厚，淹贯众有。但真正要想达到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知识都熟悉，都了

解。这对任何人来说,恐怕都是做不到的。我理解,淹博应该是有一个专业或学科界限的。对一位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对自己所研究的某一阶段的各种文体、各派理论、各个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接触得尽可能多一些,了解得更详尽一些,并以此为中心,勾前挂后,从整个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大背景上来看待这些文学现象,乃至联系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背景来解释这些现象,却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其次是识断。一项研究,一篇论文,能不能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自然要看你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不只是新颖,更重要的,是看它究竟是真知灼见,还是大言欺人。厚积薄发,博学而约取。在杂如牛毛的原始材料中筛选出最能体现自己研究对象特点和规律的东西,并找出它们和当时整个文学或社会思潮间的内在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新人耳目而又脍炙人口。至于精审,那自然是更高层面的要求。新人耳目的见解和结论,能为学界同仁乃至后辈所首肯,成为学界的共识,甚至被公认为是某一研究阶段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这才可称得上是精审的结果。这种精审,当然有赖于书斋之中的潜心研究,但同时还必须借助于研究者开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和独立的思想。

海燕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她学术研究的垫基础的阶段。她自己也正好要跨入人生道路上的不惑之年。如果说,把这本论文集当作这二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的话,我觉得,她现在应该是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最好的机遇。如能在这众多的领域中选定一个主攻的方向而兼及其他,再在文学理论方面继续增强自己的学养,在研究中发挥悟性、增强识力、有独立的思想,她的研究应该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也是我深切期望于她的。所以,在她面临这样一个新的起点时,我特地引录了戴震的这段话送给她。

是为序。

王琦珍

2014年6月5日于南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文本细读与批评

试论明初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 / 3

明初江西诗歌的崇唐抑宋倾向 / 48

胡应麟《诗薮》的再认识 / 58

窦娥的自我及其救赎 / 69

元明三国故事中“五虎上将”形象的流变与传播

——兼论《三国志平话》与早期《三国志演义》文本的关系 / 76

《三国志演义》中“七擒孟获”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本批评 / 86

从评林本看余象斗的小说编辑与批评 / 115

“罗贯中”的存在

——简析《三国》、《水浒》的文人创作成分 / 126

《水浒传》续书的叙事重构和接受批评 / 137

《新水浒》与清末民初的《水浒》批评 / 150

《麈尾》之民间风貌与文人思想 / 163

“鬼诗”故事与雅俗文学的互动研究 / 178

二十世纪古典小说研究的理性思考 / 187

第二辑 文化阐释研究

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 / 195

关公信仰的地域特色与现代风貌

——澳门、东山、榆林等地的关公文化考察 / 209

2 文本研究与文化阐释的维度

闽台关帝信仰源流 / 214

“关索”形象的文化意蕴

——历史、文学与民间信仰互动之个案浅析 / 230

论《赵氏孤儿》和《关云长》对忠义思想的解构

——对当代电影中历史书写的一点反思 / 241

“文武二帝”的文化意蕴与现代启示 / 252

古代小说中的文昌帝君形象 / 261

第三辑 版本文献研究

《三国志演义》早期刻本考述

——兼论所谓“原本”面貌 / 273

试论《三国志演义》建阳刻本的分化

——兼论其与江南刻本的关系 / 283

谢肇淛笔记三种考论

——兼论作者创作的心路历程 / 290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前言 / 304

《日本藏夏振宇刊本三国志传》前言 / 316

历代江西小说述录 / 323

后 记 / 343

第一辑
文本细读与批评

试论明初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

引 论

明初,大致是指洪武、建文两朝,其中包括明王朝的创建时期,前后大致经历了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明初诗坛复古思潮,大致是指由元末到明初一大批汉族文人,大力倡导或创作传统诗文,以力求恢复儒家正统文化的思想和现象。这股文学复古思潮是随同元末明初的政治复古思潮并行而至的。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歧视,文化上忽视中原文化传统。于是,元朝行将崩溃之际,便在汉族知识分子内部涌现出强烈的复归正统的思想。到明王朝建立,朱元璋以政治强权大力推行正统思想文化建设,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正统诗文创作群体。明初诗坛,在东南地区形成了以地域为分野的五大文人集团:吴中派、浙江派、闽中派、江右派和岭南派。他们在各自地域先后崛起,共同推衍着明初诗坛复古思潮的发展。

吴中地区,即以苏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元末曾被张士诚控制达十年之久。当时,全国各地战乱不断,唯独张士诚集团据守东南一隅,与元王朝保持时叛时降的关系,亦无意与各路起义军争雄,故其控制的吴中地区战祸较少。加上吴中自古富庶繁华,物产丰裕,故当中国其他地区大半在痛苦中煎熬之时,吴中地区的人们特别是士人阶层尚过着舒适、考究而奢侈的生活。吴地的安宁,加上张士诚集团多方招揽,礼贤文士,外地为了躲避战乱的文士多游

宦或流寓于吴。在张士诚的礼遇下,在一些富绅的赞助下,吴中文人经常定期举行诗社活动。据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载:“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吴中文人以这种诗友结社的形式来倡导诗歌风雅,主要是用以诗酒自娱,风流自赏,同时也有向文学正统回归的倾向。这中间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是杨维桢。元末明初之际,杨维桢以其专力于诗歌创作享誉东南一带,他创制的“铁崖体”,被众文人争相仿效,以致成一时风气。然而,许多诗人又没有完全拘泥于他的囿畛。究其原因,是杨维桢提倡诗歌复古的思想正适合当时文人的心态;而与此同时,他的诗作抒写个人情性,风格险怪秣丽,也引起了致力于探索诗歌艺术的诗人们的不满。一些吴中文人虽师从杨维桢,却逐渐地脱离了铁崖体的诗风,改从摹拟古诗,特别是唐诗入手,诗歌风格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吴中文人集团的诗歌在这种创作态势中达到高峰。

和吴中派并雄的是浙江文人集团。江、浙一带地势相近,地域风貌相似,两地文人的接触也更为频繁。吴派诗人王彝便深受金华学派理学思想的影响,而越派主要诗人贝琼也曾是杨维桢的得意门生。浙江派大概以金华为中心,受金华学派的影响,有较深的理学渊源。金华地区自南宋以来理学称盛,到金履祥,已是朱熹的第三代弟子。金履祥与其弟子许谦以及吴莱、柳贯、黄缙、吴师道等人在金华授徒讲学,门徒兴旺。浙江派的主要作家除刘基、贝琼等人外,他如宋濂、王祿、朱右、胡翰、苏伯衡等都先后师从于以上理学家,方孝孺则是宋濂的门人。受理学家重道轻文观的影响,浙江派大多数作家能文而不能诗。(如胡翰《胡仲子集》十卷,诗只数首;王祿《王文忠文集》二十四卷,诗赋共只三卷;宋濂《文宪集》三十二卷,诗只两卷)所以,浙江文人多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元季纤弱靡丽的诗风提出批评,从而阐明宗经重道的诗学观。

吴中文人于乱世中结谊,在明初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诗社解散,诗友凋零。后人以“吴中四杰”比之“唐初四杰”,不仅因为他们同是扬名国初,而且也同样的命途多舛。高启被腰斩,杨基输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自投龙江,徐賁下狱死。明初以吴地文人受政治迫害尤为严重,诗坛几趋于